

明代武当山提督内臣制度考略

张全晓

提 要：明代武当山提督内臣制度是明皇室管理武当道教的重要举措。明代宦官不仅长期提督武当山，而且全方位参与了武当山的各项管理工作，是明皇室与武当山之间沟通和互动的重要渠道，为明代武当道教的持续发展和繁荣鼎盛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全面客观地评价明代武当山提督内臣的地位和作用，既有助于加强对明代武当山历史文化的解读，也有助于促进对明代宦官史和明代道教史的研究。

张全晓，博士，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后，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

主题词：明代 武当山 提督内臣 武当道教

明代是武当山最为鼎盛的历史时期，明帝为了加强对武当山和武当道教的管理，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钦差提督内臣管理武当山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自宣德十年（1435）三月明英宗钦差尚膳监左监丞陈野提督武当山开始，提督内臣制度一直延续到了明朝末年，对武当山的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考察明代武当山提督内臣制度的形成与演进，探讨宦官群体在武当山的主要活动及其影响，既有助于解析明代武当山的历史文化，也有助于拓展明史和明代道教史的研究空间。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宦官尤其是明代宦官的评价普遍较低，学术界对明代宦官与武当山关系的研究还很不够，故笔者不揣谫陋，试从明代武当山志等地方文献中钩稽史料，略为考证，以期抛砖引玉，且就教于方家。

一、明代武当山提督内臣制度的形成与演进

自明成祖朱棣大修武当以后，明皇室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武当山的制度化扶持政策，使武当山的地位迅速攀升，遂超五岳而帝之，成为天下第一名山。为了加强对武当山的管理，使其更好地发挥“朝廷家庙”的作用，明成祖既钦除高道提点宫观，以严祀事，又于永乐十七年（1419）十一月任命吏部郎中诸葛平为湖广布政司右参议，不管布政司事，专在武当山提调事

务。但随着武当山管理任务的加重和宦官势力的活跃，宣德十年（1435）三月明英宗又钦差尚膳监左监丞陈野提督武当山，与提调藩臣一起负责武当山的管理，从此开创了提督内臣与提调藩臣共治武当的双重管理体制。

提督内臣制度建立以后，宦官开始频繁出入武当山。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宦官与明皇室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也比提调藩臣更易获取明皇室的信任和支持，从而成为明皇室在武当山的直接代言人。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时局的变化，尤其是武当山所在荆襄地区流民问题的日益严重，提督内臣又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和使命，他们的权力也在不断地膨胀和扩大。成化八年（1472）八月初八日，明宪宗在给内官监左监丞武当山提督内臣韦贵的敕谕中就明确赋予他维持地方治安的职责。成化十二年（1476）十二月，郧阳开府，增设郧阳抚治并湖广行都司，统筹解决荆襄地区的流民问题，韦贵又被任命为湖广行都司等处地方的守备太监。为便于管理，提督内臣府也相应地由玉虚宫移住均州。韦贵以后，武当山提督内臣兼湖广行都司等处地方遂为定制。宦官权力的迅速膨胀引起了文官集团的极大不满，他们纷纷上疏请求裁革武当山提督内臣的权力。迫于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明穆宗只好于隆庆元年（1567）下令武当山提督内臣暂停分守湖广行都司等处地方，并要求其不得干预地方事务。

但明穆宗这样做并非心甘情愿，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武当山提督内臣停兼分守的新政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万历十一年（1583），内官监太监田玉奉敕提督武当山，请兼行分守事，明神宗不顾朝臣孙维城、蔡时鼎等人的坚决反对，答应了田玉的请求，恢复了提督内臣兼分守湖广行都司等处地方的做法。直到天启七年（1627）十月明思宗即位时，提督内臣仍兼分守之职。

武当山提督内臣制度自宣德十年（1435）创始，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期间提督内臣的职责越来越多，权力也越来越大，既反映了明代武当山宦官势力的活跃，也说明了明皇室对武当山的高度重视。据刘若愚《酌中志》记载，明代司礼监外差之地仅有南京、天寿山、凤阳、湖广承天府、大岳太和山等为数不多的几处，守备太监的额数也有明确的规定，其中“大岳太和山，镇守太监一员，关防一顆，辖均州等处”^①。武当山不仅跻身司礼监外差之地，而且屡次突破额设一员守备太监的规定，曾有过两位甚至三位提督内臣同时任职的情况。成化二十年（1484）十月初四日，明宪宗敕谕内官监太监韦贵即云：“今命尚衣监太监潘记，前去与尔一同管事。”^②这是明代山志关于两位太监同时提督武当山的最早记载。正德年间，武当山添设提督内臣协同分守的情况更为普遍。正德十三年（1518），还出现了御马监太监梁英、内官监太监吕宪和御马监太监潘真同时提督武当山的局面。

明代武当山提督内臣制度是明皇室对武当山加强管理的重要举措，为了达到直接管控的预期效果，使武当山更好地发挥“朝廷家庙”的作用，更好地为明皇室服务，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就与同时并存的提调藩臣制度有很大的不同，体现了明皇室的良苦用心。首先，提督内臣多系熟悉宫室营造的内官监太监，即使原非内官监者，也多于奉敕提督武当山前后转任内官监，而提调藩臣则多由进士出身的文官担任，他们到武当山以前鲜有营造经验，故对武当山宫观建筑的维护就没有提督内臣懂行；其次，提督内臣遇事可差舍人赴京，通过司礼监直接上奏皇帝，而提调藩臣则无此特权，他们必须通过礼部上奏朝廷；再次，提督内臣一般没有任职期限，韦贵曾任职28年，王佐曾任职18年，黄勋亦任职长达28年之久，他们对整个武当山非常熟悉，而提调藩臣的任期一般都很短，多则三五年，少则不到一年，有的压根儿来不及了解武当山的情况就已被

调往他处。最后，提督内臣多兼分守湖广行都司等处地方，与鄖阳抚治相埒，而提调藩臣则兼分守湖广下荆南道，次于鄖阳抚治，故明帝的敕谕有同时给提督内臣和鄖阳抚治的，也有同时给提督内臣和提调藩臣的，却鲜有同时给鄖阳抚治和提调藩臣的。这种有意为之的制度设计，使得提督内臣在武当山双重管理体制中获取的实际权力更大，享有的地位更高，发挥的作用也更突出。诸如香钱收支等重大经济事项，虽说是由提督内臣和提调藩臣共同“选委员役收支”，但实际上“收掌出入多内臣主之”，提调藩臣基本上无权过问。诸如采办贡品等直接为明皇室服务的事项，更是提督内臣的特殊使命，提调藩臣根本无权参与。久而久之，提督内臣与提调藩臣之间便形成了一种默契，内臣治山事，藩臣理民事，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提督内臣在武当山双重管理体制中的独尊地位。万历九年（1581），分守道从均州移住鄖阳府后，提调藩臣对武当山的管理更是鞭长莫及。万历十一年（1583），内官监太监田玉奉敕提督武当山，既请复兼分守湖广行都司等处地方，又请独掌治山，分守道毋得干预，这些要求都得到了明神宗的准许。万历十二年（1584）五月辛巳，明神宗还为此专门下诏，更改给分守道的敕书，从而使提督内臣大权独揽，一度取得了管理武当山的全部权力。

二、明代武当山提督内臣的主要活动考述

第一，提督军余维修宫观道路。这是明代武当山提督内臣的首要任务，明帝在给每位提督内臣的敕谕中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点。武当山道教建筑群贵为朝廷家庙，規制高，规模大，仅明成祖就敕建了大小宫观33处，殿堂房宇多达1800余间。这些宫观建筑遍布方圆八百里武当山中，由于山高雾重，冰雪凝寒，砖瓦木植日久不免损坏，沟渠道路日久不免淤塞，因此就必须进行经常性的维修和保护。明帝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均州守御千户所的数千名正军余丁，并一体优免了他们的杂泛、征差及屯田子粒，让他们常川烧造砖瓦，采办木植，凡遇宫观殿宇有所渗漏损坏及桥梁道路有所坍塌淤塞，随即修理整治，务使宫观长年完美，沟渠道路永远通利，以虔祀事于悠久。武当山提督内臣制度建立以前，该项工作是由提调藩臣率同玉虚宫提点和均州千户所千户督令军余来完成。提督内臣制度建立以后，则改由提督内臣和提调藩臣共同负责。

第二,积极参与武当山的宫观兴建。虽然武当山提督内臣的首要任务是维修宫观,但他们也积极参与了武当山的宫观兴建,为武当山道教建筑群的丰富和发展贡献了力量。例如:武当山著名的迎恩观就是韦贵自备己资修建而成,韦贵在观宇落成之后还恳请明宪宗赐额,并奏乞将其纳入皇室家庙的行列,享有与太和宫、南岩宫、紫霄宫、玉虚宫、净乐宫、五龙宫、遇真宫等敕建宫观同等的待遇。这些请求都得到了明宪宗的首肯,明人也因此常有八宫之说。嘉靖年间负责武当山重修工程的原工部右侍郎陆杰在《敕修玄岳太和山宫观颠末》中即云:“成化间,益以迎恩,是为八宫。”^③武当山提督内臣不仅自备己资修建观,还鼎力支持明皇室的敕建工程。嘉靖年间,明世宗朱厚熜大规模重修武当宫观,虽然提督工程的官员是原工部右侍郎陆杰,但时任武当山提督内臣的王佐也积极参与。工程完工后,陆杰在《敕修玄岳太和山宫观颠末》中称赞王佐说:“提督太监王公佐终始协赞,亦可以观人心矣。”^④明世宗也充分肯定了王佐的表现,赏银四十两、三表里,以示荣宠。王佐提督武当山长达18年之久,对宫观建设一直都很热心。据明代武当山志记载,由王佐重建的武当建筑就有观音阁、玉皇阁、禹王庙、卧云亭、三义庙、三官庙、龙王庙等多处。

第三,管理道众并督促其虔心办道。明成祖永乐年间大修武当时曾从全国各地钦选了400名高道到武当山各大宫观焚修香火,同时设置提点印信衙门,钦除七宫提点,给以正六品官秩,让他们钤束道众,以严祀事。但由于明成祖特许无度牒的道士“去其余小宫观里修行”,明宣宗又特许“各道童在山焚修”,遂使武当山的道士数量迅速膨胀,管理任务也随之加重。于是,武当山提调藩臣和提督内臣都被赋予了管理道众的职责,但由于提督内臣与武当道众的关系一直都很融洽,因此他们也经常积极主动地维护武当道众的利益。弘治二年(1489)四月丁未,巡抚湖广都御史梁璟奏称:“湖广岁饥民困,而武当山道士滥费无厌,请为裁省。”^⑤后经户部覆议,原给油蜡香炷等各裁减三分之一,均州岁办獐皮、羊皮等物料及户口食盐等钞绢也不许截留以修宫观,有司军卫月止拨丁夫350人修理洒扫。然而,这一裁省措施实行不到5年,明孝宗即从提督内臣潘记之请,悉还其旧。嘉靖十九年(1540),提督内臣李学又奏建预备仓,用余积香

钱余谷贮此,以备赈本山官道。

第四,负责香钱的收支管理。武当山的香钱名义上仍然是由提督内臣和提调藩臣共同管理,但实际上自嘉靖初年提督内臣就已经凌驾于提调藩臣之上,独揽了香钱的收支大权。文征明为嘉靖五年(1526)曾任武当山提调藩臣的浙江进士卢煦所撰《明故湖广右参议致仕进阶中顺大夫东阳卢公墓碑》即云:“太和之役,尤利源所在,公虽操敕将事,惟受计而已,出纳赉省一属之中官。”^⑥隆庆三年(1569)五月壬子,户部尚书刘体乾在讨论武当山香钱时也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旧虽守土藩臣与内官共理,而收掌出入多内官主之。”^⑦提督内臣作为武当山香钱的实际管理者,在香钱的使用问题上,他们更多地考虑的是武当山的利益,积极主张存留香钱以备本山使用,旗帜非常鲜明,态度非常坚决。这与提调藩臣有很大的不同,提调藩臣身为湖广布政司右参议,守土有责,他们常因照顾地方上的利益而赞同有司借贷香钱。因此,每当有司欲查取借贷武当山香钱时,总是提督内臣具本上奏,请旨存留。据明代武当山志记载,嘉靖十年(1531)、十四年(1535)、十七年(1538)、二十一年(1542)、二十四年(1545)、三十一年(1552)、隆庆二年(1568)、三年(1569)间都曾有提督内臣针对有司借贷查取香钱的动议请旨存留本山,以隆祀典。这些借贷包括助皇上建立四郊之用、赈济饥民、补给禄粮、采办大木、修建琉璃河工程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借贷的数额也很巨大,动辄就要将本山香钱尽数查解他用。嘉靖二十四年(1545),工部为修琉璃河工程甚至要将净乐宫收藏金银圣像,尽数查出动用。嘉靖三十一年(1552),户部为抵补承天府守护官军俸粮并赈济该府所属被灾人户,不仅要嘉靖三十年(1551)内收贮香钱尽数查发承天府,还要将嘉靖三十一年(1552)未经收受的香钱再发一半。针对这些频繁发生的借贷事件,提督内臣总是援引旧制,据理力争,请求存留香钱以备本山支用。正是由于提督内臣坚持不懈的努力,明皇室存留香钱的制度化扶持政策才得以巩固和延续,明代武当山的持续繁荣才有了比较坚实的经济基础。

第五,负责为皇室采办贡品。武当山向明皇室上供仙品,最早可以追溯到永乐三年(1404)五龙宫全真道士李素希向明成祖进献榔梅。但宣德以前,贡品基本上只有榔梅果和蕲林茶,采办

者也不固定。宣德以后,尤其是随着武当山提督内臣制度的建立,上供仙品的范围便开始扩大,不仅有岁进和特取之分,还专门由提督内臣来负责采办。所谓岁进,就是每年都需要按时上供的各种物产,亦谓之常贡。武当山的岁进品物分春秋两季,春季有盐干笋、盐干鹰嘴笋、鹿尾笋、带衣笋、箬林茶、九仙子和隔山消等,秋季有蜜煎黄精、蒸晒黄精、蜜煎蒸晒黄精和蜜煎榔梅等。所谓特取,就是根据特殊需要另行采办的物品,一般不在岁进之列。根据明代武当山志的记载,明世宗嘉靖年间,特取尤为频繁。仅嘉靖二十三年(1544)至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12年间,明世宗就先后九次下旨,命时任提督内臣的王佐选取“通晓法式”的官道书符进献宫廷。据不完全统计,明世宗先后特取绶符、纸符二十七万多道,桃香版、檀香版木符三万五千余片。王佐及其继任者吕祥也因进符有功,多次得到明世宗钦赐金币的恩赏。虽然皇室特取以书符为主,但武当山其它灵产物类也是特取的对象。嘉靖二十七年(1548)六月十四日,明世宗就曾下旨:“说与王佐,本山寻采灵阳杖、万年松等红、黑、花三样荳,各不拘获日进来。”^⑧由于武当山要经常性地为明皇室采办各种贡品,因此相应的配套设施也日臻完善。例如:武当山净乐宫二门外就建有进贡厂,“岁时取土物以贡,则董其役于此”^⑨。北京正阳门外则建有崇真观,“本山年例进贡仙物及朝觐提点,俱寓于此”^⑩。

第六,组织举办各种斋醮活动。武当山作为朝廷家庙,要经常为明皇室举办各种斋醮活动。一般情况下,这些斋醮活动都要求提督内臣和提调藩臣共同主持。但有一些特殊的建醮活动,皇帝只交由提督内臣组织,提调藩臣无权参与。例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二月二十六日,明世宗钦命锦衣卫总旗王继宗奏奉圣旨银两来到武当山,让王佐精选提点官道,于次年孟春吉日在武当山玉虚宫、太和宫、南岩宫等11处修设“金篆庆圣安神奠土改忏愆斋醮三百六十分位”。这次建醮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明世宗特别强调:“说与王佐,玄岳工完安神,并做好事,别有遣命了。这十一处不系部行的事,御前先行密建,勿用有司买办香烛等项供用,一总回话来。”^⑪也就是说,这次建醮不系部行之事,而是御前先行密建,因此只交由提督内臣来办,建醮所需香烛纸札等项也不用有司买办,均从皇帝钦赐银两中开支。王佐自然心领神会,精心组织,他不仅出

色地完成了明世宗交办的密行建醮任务,还极力渲染了建醮时的祯祥效应,既迎合了明世宗的心理,也赢得了明世宗的宠信。正是由于提督内臣较提调藩臣更能领会皇帝修建斋醮的用意,举办斋醮时也能竭尽心力,因此,几乎所有这样的斋醮活动都是交由提督内臣来主持。由皇后、皇妃、太子、公主等其他皇室成员授意修建的斋醮,以弘治和嘉靖年间居多,这些斋醮活动也大多是由提督内臣来负责组织。例如:嘉靖三十三年(1554)正月十七日,舍人郭宁就赍到贞妃马氏、敬妃文氏的令旨和袍幡斋意,让王佐精选官道,于正月二十六日在净乐宫修建“玉篆庆圣贺师祝寿进袍悬幡吉祥大斋”五昼夜,陈设诸真清醮一千二百分位,为明世宗祈福消灾。

第七,负责守护山场不受侵毁。成化年间,由于荆襄地区流民日增,人地矛盾空前尖锐,流民们迫于生计,只好潜入武当山中,开挖住种,起房盖屋,给武当山的宫观秩序和山场保护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成化十七年(1481)和十九年(1483),明宪宗应提督内臣韦贵之请,连续降旨敕护新落成的迎恩宫享有与敕建宫观同等待遇,一应官员军民诸色人等,毋得侵毁褻渎。但这种只针对个别宫观庵庙的保护措施并不能有效阻止流民的大量涌入,流民潜入山中砍伐竹木和住种田地的现象仍有愈演愈烈之势。为了迅速遏制流民大规模违禁入山的趋势,成化二十年(1484)六月初六日,明宪宗又准韦贵之请,首次界定了八百里武当山的四至范围,严禁官员军民诸色人等在这个特定的范围内砍伐侵种,生事扰害,破坏山场的生态环境,扰乱正常的宫观秩序。对于那些不遵敕命违禁入山者,明宪宗严令有司要治之以法。嘉靖二十六年(1547)十一月初十日,应提督内臣王佐之请,明世宗再次明确了武当山的官山地位,重申了敕护山场的禁令,并查照山场四至范围,新立四至界碑,开列明白,永为常式。明皇室守护山场的措施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明末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游览武当山时,还对这里“满山乔木夹道,密布上下,如行绿幕中”的生态环境赞不绝口,认为这与明皇室敕护山场的国禁政策有很大的关系^⑫。

第八,提督官军维持地方治安。由于荆襄地区的流民问题日益突出,流民起义时有发生,明皇室为了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遂授权武当山提督内臣参与地方军政事务,提督官军防御盗贼。成化五年(1469)五月二十四日,明宪宗在敕谕

提督内臣韦贵时就特别要求他于“工完无事之日，仍提督正伍官军，操守城池，防御盗贼”^③，这说明至迟自成化五年（1469）起，武当山提督内臣就已被赋予了维持地方治安的职责。韦贵也果然没有辜负明宪宗的信任和重托，很快就因剿匪有功而受赏。据《明宪宗实录》记载，成化八年（1472）五月戊午，“以擒获荆襄逆贼升右监丞韦贵为左监丞”^④。成化十二年（1476），郧阳开府，增设郧阳抚治并湖广行都司，韦贵很快又兼分守湖广行都司等处地方，全面参与维护荆襄地区的社会稳定。虽然隆庆年间曾敕命提督内臣暂停分守一职，但没过多久就又恢复了原来的做法。直到明朝末年，武当山提督内臣仍兼行分守，参与地方军政事务的管理。

第九，积极参与武当山志的编修。明代是武当道教最为鼎盛的历史时期，武当山志的编修也蔚为大观，在修志实践和修志理论上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先后有六部山志问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山志体系，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山志文化。提督内臣作为武当山的主要管理者，对武当山志的贡献也功不可没，他们不仅亲自组织纂修新志，还支持山志的编修刊刻，并多次补续前人旧志，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武当山山志文化的内涵。嘉靖二年（1523），武当山提督内臣御马监太监潘真、尚衣监太监赵荣重刻任自垣撰《太岳太和山志》15卷，这是迄今所知明代武当山提督内臣参与山志编修的最早记载。嘉靖十五年（1536），湖广布政司右参议武当山提调藩臣方升辑成《大岳志略》5卷，刊刻时也得到了时任提督内臣李学的大力支持。嘉靖三十五年（1556），武当山出现了第一部由提督内臣主持纂修的山志，这就是由内官监太监武当山提督内臣王佐修、均州学正慎旦等纂的《大岳太和山志》17卷。嘉靖四十年（1561），王佐的继任者吕祥也以修志为己任，在王佐山志的基础上复为增刻。万历十一年（1583），时任武当山提督内臣的田玉则再次增刻。

第十，完成明皇室交办的其他任务。提督内臣作为明皇室在武当山的直接代言人，深得明代诸帝的信任，不仅职掌本山一应事务，兼行分守湖广行都司等处地方，还要完成明皇室临时交办的其他特殊使命。成化十六年（1480）十一月初五日，明宪宗就曾敕谕提督内臣韦贵，让他妥善处置梁庄王夫人张氏病故之后的相关事宜。弘治四年（1491），适逢刑狱五年审录之期，明孝宗在这一年的五月初三日，特别敕谕武当山提督内

臣兼分守湖广行都司等处地方内官监太监韦贵、抚治郧阳等处右副都御史王道并巡按监察御史、分巡官、分守官等人，钦命他们审录罪囚，以伸冤抑，以致祥和。弘治八年（1495），全国各地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湖广地区尤为严重，明孝宗为安抚民心，稳定秩序，遂于是年九月二十五日，特别敕谕武当山提督内臣兼分守湖广行都司太监潘记、抚治郧阳等处右副都御史沈晖并巡按监察御史、分巡官、分守官等人，钦命他们洗心涤虑，痛加修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修废举坠，兴利除弊，以消愆弥祸，祈福迓祥。嘉靖三十一年（1552）五月初七日，明世宗钦命舍人李望赉御药一万袋来到武当山，交与提督内臣王佐，让他给散各宫观道官道士。嘉靖三十二年（1553）闰三月十二日，明世宗又钦命舍人王逊送御药五千袋来到武当山，命王佐给散在武当山维修宫观的工匠人等。

三、明代武当山提督内臣的历史评价

明代宦官长期提督武当山，与武当山的关系非常密切。同时，他们与明皇室的关系也非常特殊，深得明皇室的信任。在明皇室的大力支持下，宦官集团逐渐凌驾于文官集团之上，取得了管理武当山的主导权。随着宦官权力的日益膨胀，他们与文官集团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权力博弈。虽然在明皇室的偏袒下，宦官集团占据了斗争的上风，但文官集团对他们的攻讦和批判却从未停止。

隆庆元年（1567），文官集团趁明穆宗新政之际，再次发起了对武当山宦官群体的猛烈抨击。是年七月壬申，巡按湖广监察御史陈省题参时任武当山提督内臣的内官监太监吕祥：“一则凌轹有司，滥受词讼；一则占富民以克佃户，受诡寄以避差徭；一则采笋尖而巧于纳赂，派乡民而忍于戕生；一则假进贡以骚扰驿递；一则假薪草以横敛居民；一则岁折修造夫役银三千两而重行科征；一则岁克香烛斋粮银四千两而毫无支给。”陈省不仅一口气罗列了吕祥扰害地方的七大罪状，还言之凿凿地宣称：“刀锯之余，终鲜忠良，罔知民瘼，委以事权，末有不生事者。”^⑤陈省对吕祥的批判，代表了传统史家根深蒂固的政治取向与思维模式。倘若仅就文官集团的攻讦和批判而言，武当山提督内臣简直就是十恶不赦和一无是处，但陈省弹劾吕祥罪七的措辞显然是沿袭了阉宦祸国的传统观念，同时也流露出文官

集团的傲慢与偏见。当这种先入为主的道德评判与针锋相对的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时，宦官们自然就成了文官集团口诛笔伐的对象。然而，倘若从明代武当山志以及相关的碑刻、墓志等记载来看，提督内臣却是明皇室与武当山之间沟通互动的重要渠道，如果没有提督内臣的据理力争，明皇室对武当山的一系列制度化扶持政策也许早就不复存在了。自宣德十年（1435）武当山提督内臣制度建立以后，他们不仅全方位参与了武当山的各项管理工作，而且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为明代武当山的持续发展和繁荣鼎盛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由于宦官集团在武当山行政管理体制中的权力日益扩大，他们与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就不可避免。纵观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初期主要表现为提督内臣与提调藩臣之间的博弈，自提督内臣兼分守湖广行都司等处地方之后，则主要表现为提督内臣与郟阳抚治等台省官员之间的博弈。虽然在明皇室的偏袒下，宦官集团占据了斗争的上风，提督内臣的地位日益提升，明皇室对武当山的一系列制度化扶持政策也得以巩固，但文官集团的口诛笔伐却在某种程度上遮掩了历史的真相，影响了我们对明代武当山宦官集团的认识和评价。事实上，明代武当山宦官集团既非十恶不赦，亦非一无是处。当我们努力从明代武当山志以及相关的碑刻、墓志中捕捉宦官集团的另类历史记忆时，我们就会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这两种历史版本的截然不同。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早就指出：“（中国）历史大都是宦官的对头们写的，结果很多替国家工作得很好的宦官，都没有被载入史册。因此，对于史官们所记述的有关宦官活动的阴暗面，应当采取保留的态度。”^⑩赵世瑜教授也通过对北京一个宦官祭祀组织黑山会的研究，得出了与李约瑟先生大致相似的结论：“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有理由进行这样的假设：历代史书对宦官的大张挞伐是有文人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的，它本身就是一种知识精英的历史版本。”^⑪为了尽量避免传统文本的历史局限，力求客观公正地评价宦官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赵先生主张研究者要能够捕捉宦官自己的某些历史记忆，至少要了解他们是怎样按照自己的逻辑来编制另一套与士大夫所讲的不同的故事。因此，赵先生特别强调要自下而上反观历史，要充分挖掘碑刻、墓志中

的宦官史料，让这些另类历史记忆浮出水面，为宦官问题的深入研究开辟新的视野^⑫。

李约瑟先生和赵世瑜教授的论断提醒我们，我们对明代武当山提督内臣的评价必须跳出历史上文官集团对他们的攻讦和批判，跳出传统政治史的研究窠臼，用新的视角和新的材料对他们加以新的审视，惟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得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也才有可能通过对明代武当山提督内臣制度的考察，为明代道教史和中国宦官制度研究提供一个鲜活的例证。

（责任编辑：首之）

- ①刘若愚著、冯宝琳点校：《酌中志》卷16“内府衙门职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99页。
- ②王佐修、慎旦等纂：《大岳太和山志》卷8“敕提督内臣”，明嘉靖四十年（1561）吕祥增刻本。
- ③④王佐修、慎旦等纂：《大岳太和山志》卷16“艺文”，明嘉靖四十年（1561）吕祥增刻本。
- ⑤《明孝宗实录》卷25“弘治二年（1489）四月丁未”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 ⑥文征明：《甫田集》卷35《明故湖广右参议致仕进阶中顺大夫东阳卢公墓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 ⑦《明神宗实录》卷270“隆庆三年（1569）五月壬子”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 ⑧王佐修、慎旦等纂：《大岳太和山志》卷10“上供仙品”，明嘉靖四十年（1561）吕祥增刻本。
- ⑨⑩王佐修、慎旦等纂：《大岳太和山志》卷1“宫观分图”，明嘉靖四十年（1561）吕祥增刻本。
- ⑪王佐修、慎旦等纂：《大岳太和山志》卷4“御制斋意”，明嘉靖四十年（1561）吕祥增刻本。
- ⑫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1下《游太和山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⑬任自垣纂：《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2“诰副墨”，明弘治增刻本。
- ⑭《明宪宗实录》卷104“成化八年（1472）五月戊午”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 ⑮裴应章修，彭道古等纂：《郟台志》卷3“宪体”《兵部咨为楚民困敝已极恳乞圣明轸恤并处太事宜以苏凋瘵事》，明万历十八年（1590）刻本。
- ⑯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225页。
- ⑰赵世瑜、张宏艳：《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 ⑱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